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记忆史的视角



姜亦菲 著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记忆史的视角



姜磊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 / 娄岢菲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1 - 1196 - 6

I. ①重… II. ①娄… III. ①蔡元培(1867-1940)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037 号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记忆史的视角

著 者 / 娄岢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梁艳玲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196 - 6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一章 长校, 1917 ~ 1922	032
第一节 现实境遇与思想资源	033
第二节 延揽人才与重塑学风	043
第三节 开出风气与酿成潮流	070
小 结	088
第二章 辞离, 1923 ~ 1926	093
第一节 怀疑之声渐起: 1923 年辞职风潮	094
第二节 已有微词: 1926 年复职风波	131
小 结	149
第三章 淡出, 1927 ~ 1930	153
第一节 北伐前后的南北教育界	155
第二节 蔡元培与北平大学区风潮	170
小 结	206
第四章 纪念, 1917 ~ 1949	210
第一节 北大校庆纪念中的“蔡元培”	211

第二节 蔡元培纪念仪式之解读·····	229
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	239
小 结·····	261
余 论·····	265
参考文献·····	270
索 引·····	286
后 记·····	292

一 问题缘起

蔡元培从清朝翰林公到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从兴办新学、游学欧洲到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是从声望、资历还是从对教育的实际影响来衡量，民国教育界中恐怕难有出其右者。比起其他近代教育思想家与实践家，蔡元培已经超越具体的教育领域而具有思想文化的精神意义。

诚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①杜威的这段评价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从某种层面上说，无论作为历史过往的杜威或其他的同时代者，还是栖身于当下的诸多研究者，皆不过只是蔡元培个人历史的诠释者。但是，当此后诸多研究者不断重复引用杜威的评价之时，杜威诠释者的角色就已经开始逐渐淡去，历史叙述便成为另一种“历史”。与其说研究者在不断引证中达成了对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看似一致的理解，毋宁说引证背后也暗含各个研究者自身

①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22页。

的研究立场、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这里并非否定杜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历史评价，更不是要抹杀蔡元培在民国教育学术理论与实践中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而是意欲追问：这种不断追述、叠加的叙述方式是否给对蔡元培的诠释带来了影响？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① 与之相关的大部分问题，如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背景、具体过程及后世影响等，学界都已有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和理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认识已经成为理解和诠释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的“常识”。不过，“常识”有时也

① 相关代表性论著，可参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叶隽考释《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吴家莹《校长如何实践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经验》，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该书初版名为《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由台湾花莲师范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于1992年出版）；张晓唯《蔡元培》，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2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99～269页；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史华慈（B. I. Schwartz）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以蔡元培1917年～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可参见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以及北京大学校史馆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所列论文目录。

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或掩盖历史本身应有的多姿多彩，某些太过大而化之的写意描述，反而使蔡元培在“炙手可热”的研究中缺少了些许人性的光彩。梁漱溟尝言，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①如何开风气，如何酿潮流，非短期可以预见，需要在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与历史沉淀之后才能更加彰显。比如说，蔡元培在长校期间给北大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该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北大教师与学生以及其他大学如何看待蔡元培和北大？对蔡元培的诠释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否也存在着互动？如果这种互动存在，它又是怎样影响对蔡元培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解读的？这些都是以往研究关注不够、未能尽然解决的问题。

近代中国大学是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与承袭中国已有的教育学术传统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诸多杂糅中西的思想与制度上的革新，重塑了北大自身的品格和传统，不仅被视为近代大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也逐渐成了近代大学改革的精神象征。不妨先看三段论述。

1978年5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参加了蔡元培墓竣工典礼之后感慨地说：“在学术‘自由’、‘容忍’与‘尊严’的理念导引下，蔡先生为学术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实政治（当时的北洋军阀），社会势力（当时舆论对他领导的北大绝不是没有批评的）之外的天地，一个纯净的、独立的学术天地。……蔡先生一度建立的具实的学术天地，已成为一象征的学术世界。这个象征的学术世界是百家争鸣、千岩竞秀的世界，它是读书人所永远梦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征的存在也必将是永恒的！”^②

①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144页。

② 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第86页。

1998年5月，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提交论文《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总结了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他认为，尽管蔡元培长校时间不长，“但他在北大所奠定的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却一直绵续下去，垂诸久远。而且它的影响极为深广，远远超越北京大学一校的范围”。^①

2005年4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以《世上已无蔡元培》为题，面对悄然落幕的北大人事改革，感慨道：“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②

表面看来，列举相隔近三十年的三则引文有些突兀，不过，无论是曾为蔡元培撰写口述自传的高平叔，还是曾为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抑或是当下北大燕园一分子的韩水法，表达出的都是对蔡元培的历史地位基本相同的体认，即都把蔡元培置于超越个人层面的思想史上进行讨论，将其代表的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与传统作为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精神的象征。这种由个人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的超越，根源于蔡元培在民国教育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与实际成就。尽管论者更多是从经验层面而非严格学术层面强调蔡元培的象征意义，但其合理性正体现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之中。蔡元培获得的超越个人意义的解读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实现的。这种基于经验层面的解读，特别是民国教育学术亲历者的体悟，殊为珍贵。不过，若进一步追问对蔡元培的诠释是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形成，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仅限于经验层面的描述性判断则略显出解释力的单薄。

伴随着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掀起的追溯北大历史的热潮，蔡

①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研究集》，第122页。

②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读书》2005年第4期，第3页。

元培出长北大期间的历史也与梳理中国大学传统、提炼中国大学精神、展望 21 世纪大学发展等一系列讨论联系到一起。以此为契机,不少有关北大历史与蔡元培思想实践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① 与从经验层面讨论蔡元培的超越意义相比,蔡元培在北大的诸多革新被视作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且开始以一种学术化姿态呈现。尽管有学者在研究策略和叙述笔调上选择了“第三种笔墨”^②,但从学界整体研究热点来看,对蔡元培超越个人意义的解读还是在中国大学精神的内涵、特征等结构性框架“规范”下逐渐走向了抽象化和概念化。^③ 大部分讨论大学精神的著作皆采取了相似的叙述策略。具体来说,更关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十余年间,尤其是 1917~1923 年实际长校期间的历史,通过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方针、教师聘任、课程设置、学制改革等方面的考察,对比蔡元培长校前后北大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学术风气开放与政治觉醒,以此证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而抽象出若干描述性特征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代表。作为一种研究取向,以预设的逻辑框架将对蔡元培的诠释分割为若干抽象化的概念,固然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抽象化、概念化的框架排斥的正是社会中感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反而将复杂

①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北大历史和蔡元培的著作,包括: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②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 372 页。

③ 相关著述可参见高天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4 年 10 月;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另外“大学精神”也以标题形式出现在有关中国大学问题的历史文选中,参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何光沪等编《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简单化。这种基于抽象层面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解歧义、史实模糊等诸多问题，反而为理解蔡元培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混乱。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中国大学的某种象征，因为其不仅是停留于思想领域的乌托邦，更重要的在于曾经真正尝试着在实践中去推动某些变革。但是，无论是从一般经验出发，抑或是抽象讨论大学精神，关注的都只是抽离于历史具体情境之后的结论，放弃的是考察蔡元培及其北大改革如何获得普遍象征意义的过程。而对进程的忽视，也就同时丢掉了只有在过程中才能显现出的某些问题。历史本身呈现出的复杂性有时会远远大于我们的认知。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并不只是象牙之塔的内部活动，而是牵涉到晚清民国以来的教育文化传统，动荡政局影响之下的多重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学术派别之间学术观念的此消彼长等诸多因素。而以蔡元培塑造的北大作为效仿的对象，由认同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继而追寻蔡元培的办学足迹，更是包含了对中国大学发展之路的理性探索和复兴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并进而与近代中国大学重塑自己的传统和精神联系在一起。因此，本书选择以历史记忆的视角来描述蔡元培如何被记忆、被重构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关于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历史记忆的流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大学精神逐渐凝炼形成的过程。

二 记忆史的视角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大踏步发展，历史学危机之声不绝于耳。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叙事的转向”，使历史学的客观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场由史学理论研究者推动的变革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历史学的基本定位和假设进行反思，历史如何书写与记忆如何存留的问题即是其

中讨论的热点之一。

历史与记忆都是与探讨如何看待过去相关联的,学界也存在将两者径直等同或相互对立的看法。^①与心理学关注记忆的心理机制不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较早关注了记忆的社会性问题。他认为,“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历史只有在回忆无法存留时才被需要。^②1925年,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作为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的哈布瓦赫,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做了进一步引申,提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③以往人们对记忆的认识,大多只强调其个体性,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他区分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使个体可以将自身置于框架之中来进行回忆,同时集体记忆也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中体现自身。所有有关个人回忆的讨论都需要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特定的群体情境中的个体,都是利用相应的集体记忆才得以凝聚记忆或再现过去。^④哈布瓦赫的开创性研究,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研究中区分出来,奠定了此后有关记忆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围,如遗忘、纪念性活动或仪式等主题。

①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4~6页。

②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德]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伟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87页。

③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页。

④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68~71页。

在哈布瓦赫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提出了“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概念，探讨的是“群体的记忆如何传送和维持”的问题。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① 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他指出，社会记忆通过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和最具操演性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形塑个体记忆。具体来说，“仪式”是指“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仪式是对过去的重演的一种方式，其重复性本身就是延续过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个人和认知记忆的集体式变体以外的东西”。仪式对参加者起到了说服的作用，参加者不能仅仅“在认知上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操演”，还必须习惯于这样的操演。这种习惯会表现于“操演的身体基础上”，即“身体实践”。^②

在讨论记忆的基础时，哈布瓦赫和康纳顿都强调的是其社会层面。哈布瓦赫甚至略带夸张地表示，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没有任何记忆。但即便是个体记忆也是以语言和意识为基础，同样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如哈布瓦赫所言，纯粹的个体记

①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0页。

②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1页，第49～51、81页。在对仪式研究较为深入的人类学领域，仪式一直被视为诠释人类情绪、情感以及复杂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从表述和内容方面看，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对仪式问题的关注有一个明显的从“宗教”到“社会”的内在变化。仪式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仪式的集中讨论，可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对于中国具体问题的集中讨论，可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忆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一个例外”。^①在此基础上，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将记忆分作三种形式：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维度的个体记忆、属于社会维度的交往记忆和属于文化维度的文化记忆。^②“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是指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依存于个体之间，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产生，随着代际更替而变化 and 消失，时间跨度以三四代为限度。从结构上而言，交往记忆颇为接近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强调的都是记忆的社会维度。“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中的“文化”是指“为了构筑各具特色的群体并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联系而进行的各种活动”。^③文化记忆在离开承载记忆的主体之后仍能够存续，是以象征物的形式被客体化的记忆。^④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有不同的“时间结构”。交往记忆在三代人之间循环，因此会组合为“共时性的记忆空间”；而文化记忆指向的则是遥远的过去，形成的是“历时性的时间轴”。^⑤

文化记忆概念的提出，也是与二人具体的史学实践密不可分的。以扬·阿斯曼为例，他在专著《摩西这个埃及人——西方一神论中对埃及的记忆》中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记忆史”（mnemo-history）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观念史、心态史等的史学分支。作者以摩西形象的被改造、摩西崇拜的埃及根源以及摩西

① [德] 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18~19页。

② [德]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

③ [德] 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金寿福译，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④ [德] 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1页。

⑤ [德] 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23页。

在近代的被接受情况为中心，集中考察了一神教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对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阿曼斯教授在书中指出，“记忆并非简单地对过去事实的储存，而是持续不断的重构想象的工作”，所以，记忆史是“有意识地淡化所探究的对象的共时面向，以突显回忆之贯时的或垂直的轴线。它集中于那些意涵或相关性的面向，这些面向在参照到过去的意义下是回忆的产物，并且唯有在后来的回溯及文献的光照中才会站到前景来”。^①也就是说，“记忆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发掘关于流传的可能“真相”，“而在于把流传当作是集体的或文化的记忆的现象来研究”。在此基础上，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的研究领域。^②随着阿斯曼夫妇专著简体中文版的译介与出版，二人对记忆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手法上的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文学界的关注。

在史学实践层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投身记忆的研究。以法国为例，自197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家对“集体记忆”问题的关注与心态史研究的多样化以及“民族回归”“民族特性的复归”等主题相关。^③到了1980年代前

① Jan Assmann, *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汤志杰：《追寻记忆的痕迹——二阶观察的解谜活动》，《新史学》第14卷第3期，2003年9月。

②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 - Summer, 1995), pp. 125 - 133. [德] 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兵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德] 扬·阿斯曼：《文学的记忆》，曲平梅译，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39～55页。

③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443～455页。相关的方法论的反思，可以参考 Jeffrey K. Olick, Joyce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ume 24 (1998), pp. 105 - 140。

后,这股潮流从社会史转向政治史,重点在于研究法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他认为,历史与记忆远非同义词,而是相互对立的。他给出的“集体记忆”的定义是:“如果从最为相近的意思来说,集体记忆就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对过去的、被赋予神奇化的经历的回忆,或是这些回忆的总和,不论这种回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的认同是通过对过去的感情整合而形成的。”^①此后,他萌发了撰写“场所”(les lieux)丛书的计划,并先后召集了120位作者,历时十年,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②“记忆之场”是指集体记忆的凝聚点,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地区、城市、名胜古迹;象征物,如国歌、口号、谚语等;或是某些机构、出版物、公共节日和历史事件等。他表示,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差别只在程度不同。他进而举例说,像档案馆这种看起来纯粹实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同时,像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等纯粹功能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进入记忆之场”。^③诺拉进一步指出,记忆之场是记忆和历史相互作用和影响。要有历史、时间和变迁的发生,且有“记忆的愿望”,才能形成记忆之场。他继而解释道:

场所是混合的场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

①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09~210页。

②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16页。

③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0页。

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这螺旋就像自我盘绕的乌比斯环一样。因为很显然，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①

以《记忆之场》为代表，诺拉也在法国史学界推动了对历史学的反思，使有关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②

从记忆相关的主题来看，记忆问题的讨论是与回忆、纪念、遗忘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哲学层面，记忆是构成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之一，而遗忘则可能导致历史解释链条的断裂，因此有关记忆的研究也反映出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反思。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也曾涉及“社会忘却”问题。他虽然肯定了仪式的作用，但并不认为所有的社会事件都能成为纪念仪式，被选中的纪念仪式也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因此如何做出选择就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他指出，“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沉淀，因此有破产的危险。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③

自198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不少学者借由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的对历史创伤的研

①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1页。

② 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76～89页。

③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8～10页。